

# 老师病了

■ 王建荣

“不好了，老师生病了！”早上天刚亮，同学们已经洗漱完毕，每人带着一个碗一双筷子，在木棚下的一张木桌前排成一队，准备吃早饭。听到刘丁一的喊声，同学们才注意到，平时早上总是第一个到木棚下的陈老师不在场。

1976年冬天，我们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半导体器件五字班的八男六女，外加半四班的一男一女，共十六个同学，由给我们授电路课的陈兆龙老师带队，来到四川安县秀水镇进行开门办学。当年，在毛主席提出学生“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”的号召下，国务院科教文组与国家财政部于1974年9月29日联合发出通知，认为“开门办学”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，要以工农兵为师。开门办学，就是学生到工厂、农村、部队等基层单位参加实践活动，使书本知识和实际结合。

秀水镇离安县城五十公里。有一条和它名字同样美丽的河流从中间流过，这就是秀水河。河两边是山坡和丘陵。当时人口不足两万。这次开门办学，目标很明确：一是给安县办一个无线电短训班，为安县的发展培养一批技术骨干。二是我们来前刚学习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和工业自动化系合编的《晶体管电路》，让同学们到社会上进行了一些实际操作，进一步理解理论知识，提高动手能力。秀水镇虽然不是县城，但这里交



照片中第二排居中者为本文作者王建荣。他身后戴眼镜者为陈兆龙老师

通方便，在当时是安县最富饶的地方。县里宣传部就将培训班安排在了这里，并在我们到来的半月前，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发了通知。

农村生活虽艰苦也乐在其中。比如洗漱，就是从水缸内舀出一瓢冷水，倒入一个搪瓷盆，几个同学共用。大家用水在脸上上下抹两下，再拿毛巾把脸上的水擦干净就完事了。女同学会比男同学认真一些，她们从口袋内掏出一个金属的小圆盒子，打开可看到白色的膏状物，闻到一股清淡的香味，这是当时唯一流行的化妆品，名字叫雪花膏。她们用食指沾一点点，放在手心上，两个手掌相对，轻轻地搓几下，然后细细地在脸上游过。年龄最小的女同学余盛琴，是到学校后才知道脸上涂上这种东西会好看，也照猫画虎地做，但总也不得要领。加上入校前干农活，皮肤晒得

较黑，脸上经常是一块白一块黑。同学们就会说她是花脸。但她一点也不生气，总是哈哈笑着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圆镜子，照着重新把妆抹匀。

那年的冬天出奇的冷。听到“老师病了”的喊声，大家像听到命令一样，撒腿就向陈老师住的小屋子跑去。有几个已经打了稀饭的同学，也端着碗紧跟在后。

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面积不算小的四合院，看样子是解放前一个地主的老宅子，房屋还真不少。除了伙房和与之相连的饭棚，还有一个放着乒乓球桌的大房子，正好用来安放我们从学校带去的部分电子仪器。另还有一间更大一点的房子，正可以用来当上课的教室。男女同学分开住在另外两间较大的屋子里。由于房子是瓦房，屋子空旷，晚上躺在床上可直面屋顶。晴朗的夜晚，还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。

陈老师独自住在一间除了放一张床、一张三斗桌，几乎不剩空间的小房子里。本来陈老师是和男同学一起住在支着大通铺的大房子里，但刚去住的第一个晚上，劳累了一天的老师倒下就进入了梦乡，很快就响起了呼噜声。而九个男学生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，刚到新地方，好不兴奋，再听到老师那如打雷样的鼾声，更是难以入睡。有几个同学一晚上几乎没有合眼。第二天，当兵出身、被同学们称为“老谋深算”的李贵万和小机灵鬼刘丁一合谋，晚饭后招呼同学们都聚在男生宿舍。刘丁一对老师说：“陈老师，您和我们大伙住一起不仅休息不好，而且同学们要向您请教问题也不方便，我们给您找了一个单间。”说着就对同学们挤眼睛。谭维真、刘铁平、焦长英、李小娅、余盛琴、梁艳，还有半四班的一个女师姐，七个女孩也在一边起哄帮腔，围着老师，有搀扶的，有拉手的，笑着喊着“走了，咱那个地儿！”簇拥着老师离开了集体宿舍。高德宏、刘漠善、



同学和部分当地干部合影。照片中唯一戴眼镜，并且有点害羞的是陈老师。



前排左为焦长英，中间两位是秀水的干部，右边是半四班的同学。后排左起：谭维真、梁艳、李小娅、余盛琴、刘铁平

张军、杨卫国趁机一起动手，把老师的被褥和简单的行李搬到了早由罗公义打扫干净的小屋子。老师看这阵式，也不再坚持。就这样让一帮孩子哄到了单间。

老师的床和我们的一样，就是在两个长板凳上架了一块门板，门板上再铺一床薄薄的被子，没有床单。另有一床被子晚上盖。四川的冬季，晴朗的白天气温尚可，晚上却很冷。那时的南方，冬天没有任何取暖设施，连烧木炭或烧木柴取暖都不可能。

大家围在老师的床边。只见老师紧闭着眼睛，

露出的半张脸通红。我用手碰了一下老师的额头，立即感到发烫。老师一定是在发烧！

当地来参加无线电短训班的有三十多人，都是安县广播站和各个公社管宣传的干部。短训班开办半个月来，我们同短训班的干部一同听老师讲课，一块儿动手装配收音机，后来又一起为当地群众修理收音机。理论课和实践课交叉进行，课程安排得紧张有序。最忙的是陈老师，白天给参加学习的干部讲电阻、电容、电感、二极管、三极管的性能和在电路中的作用，再讲晶体管电路中的单管功率放大电路、乙类推挽放大电路、震荡电路、滤波电路、保护电路，后来用当时农村仅有的半导体收音机电路进行实际讲解，并用从学校带去的一些元器件，让他们动手装配收音机。陈老师讲课风趣，通俗易懂，听课人员来前就知道是清华大学的老师给讲课，现场又见到戴着眼镜、和学生交谈时偶尔会冒出一句外国话的陈老师，更是高兴得不行，所以听讲更为认真起劲。尤其是他们自己动手装出的收音机发出声音的那一刻，他们会激动地一边蹦一边喊：“我的收音机响了！我收音机响了！”这些参加无线电短训的干部，在安县后来的通信工作中都成为了带头人和骨干。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，同学们不仅提高了动手能力，而且感受到了这些基层干部对人的淳朴善良，对学习的认真刻苦。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，为我们后来在校刻苦读书树立了好榜样。

我们去的十几个学生不仅又多听了一遍老师讲的理论课，而且还通过维修收音机和广播站的一些旧设备，巩固了晶体管电路知识。晚上，老师又耐心解答学生和干部们提出的诸如电路工作点的设置、正负反馈电路反馈深度的计算等问题，指导我们为周围居民修理送来的半导体收音机，经常到很晚才可以休息。这样半个月下来，老师


能不累坏吗？

只见老师蜷缩着腿，罗公义用手伸进被窝，一摸老师的脚，温度不高，几近冰手！一看，同学们才明白，原来用门板搭起的木床太短，盖的被子也不够长，老师睡觉要伸直腿，脚就会露到被子外面。脚不冰才怪呢。

看到老师病成这样，我们都着急得不知咋办，女同学中已经传出了哭声。还是李贵万镇静。他把大伙先招呼到小屋外面，然后提高嗓门说：“不要慌，要紧的是请医生来，同时给老师保暖。”经他这么一提醒，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了一些。大伙立即行动了起来，李贵万和高德宏赶紧跑去找住在另一个院子的短训班领队，让他带着去请医生。北京来的焦长英和刘铁平跑到女生宿舍，拿来了两个红色的橡胶热水袋放到老师的脚边。刘丁一和几个男同学跑去抱来两床被子盖在老师身上，还特意把老师的脚用被子裹了个严实。罗公义和张军还把他俩的黄色军大衣也拿来盖在老师身上。谭维真拿来一个竹外壳的热水瓶，倒了一碗热水，其他同学急忙扶起老师喝下……

同学们还在老师身边忙乎，村里的赤脚医生挎着一只药箱急急赶到了。赤脚医生给老师测了体温，打了一针退烧药，又给留下了几小包口服药，吩咐了服用方法，临走说了句“不要紧”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

在老师生病的日子里，他的学生轮流陪护在身边，喂药、喂饭、喂水、换热水袋……

如今，四十多年前发生的那些事，就像昨天一样。大学师生生活的那种简单快乐，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爱和谐，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亲密友爱，历历在目。每每想起，我就会潸然泪下。这泪里包含有对大学时代的怀念，更有作为清华学子的自豪！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半导体器件1975级校友）